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6

Position Paper

June 2020

Precariat：一個階級概念的回顧與爭論

李曉天

© 著作權聲明

本文著作權屬作者擁有。文章內容皆是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中心立場。除特別註明外，讀者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工作論文，作個人使用，並引用其中的內容。

徵引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工作論文系列文章，需遵照以下格式：作者，〈文章題目〉，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工作論文，ISSN 2707-2193，文章編號，文章所在網址。

© Copyright Information

The authors hold the copyright of the working papers.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e ICCS Working Paper Series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ose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Users may download the papers from ICCS website for personal use and cite the content,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Citation of the ICCS Working Paper Series should be made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Author, "Titl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Working Paper, ISSN 2707-2193, No. #, URL of the publication.

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Rm.103 HA Building 2, 1001 University Road

Hsinchu, Taiwan

Tel: +886-3-5712121 Ext.58274, 58272

Fax: +886-3-5734450

Website: https://iccs.nctu.edu.tw/en/wps_list.php

Email: iccs.wps@gmail.com

Precariat：一個階級概念的回顧與爭論

李曉天¹

摘要

近年來，precariat 作為以全球勞工所面臨的不穩定性為基礎的一個新的階級概念引發了廣泛討論。本文回顧了 precariat 作為階級概念的主要內涵與經驗分析，並從馬克思主義視角批評了這一階級概念的主要問題。在全球南北分化的背景下，precariat 概念的討論也產生了南北分化。在發達國家背景中，它主要啟發了「公民權」與勞工運動的關係的思考；可以將這種思考置於西方勞工運動研究正在重新發現波蘭尼的大背景之下，「波蘭尼式運動」已成為思考勞工運動的重要維度。而在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不穩定性」議題被轉化為「不穩定化」過程中資本、國家與勞工相互角力的結構性分析，勞工研究辯論的焦點是勞工抗爭到底會因為不穩定性遭到削弱、還是因為加速的無產階級化而日趨激烈。本文最後以全球疫情危機下的兩個案例討論了勞工運動的敘事問題。無力提供「行動的敘事」是 precariat 概念在勞工運動研究中缺乏活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Precariat 是近十年中在西方勞工與階級研究領域一度非常流行、但也極有爭議的概念。Precariat（直譯為「不穩定無產者」，或譯「流眾」，取「流動」與「大眾」之意）來自於 precarious（不穩定的）和 proletariat（無產階級）兩詞的組合，意指處於不穩定雇傭關係中的無產者們正在形成的一個新階級。(Standing, 2011)對勞工的不穩定性處境的關注由來已久（包括 precariat 概念的提出者斯坦丁本人，Standing, 1999），不穩定性也正在成為西方國家雇傭關係中最為重要的特徵之一，標誌著從二戰後的凱恩斯主義的社會契約向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契約的範式轉變（Kalleberg, 2009），在這樣的背景下，勞動運動

¹ 李曉天曾先後就讀於北京清華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目前于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攻讀博士學位，主要關注中國互聯網經濟領域中的工作體驗與勞工議題，他的研究興趣也包括移民勞工、性與性別、創意勞動等。聯繫方式：xtli@connect.hku.hk. LI Xiaotian is a PhD Candidate of Sociology 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orking on a project of labor process in the Chinese Internet economy. He received his Bachelor in Sociolog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Master in Sociology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labor and migration, gender and sexuality, and creative labor, etc. Contact him at xtli@connect.hku.hk.

的討論確實應該思考 precariat 作為階級行動者的可能性。在實踐中，precariat 概念的推廣者重新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basic income movement)等行動綱領²(例如，Foti, 2017)。然而，也有學者認為不應該使用一種靜態的觀念區分出一個 precariat 人群，而應該使用「不穩定化」(precariatization)這樣的動態概念來追蹤當代勞工處境的變化(例如，Alberti, Bessa, Hardy, Trappmann, & Umney, 2018; C. Lee, 2016)；同時，這樣一個大膽的階級概念本身也招致了很多批評(例如，Breman, 2013; Offe, 2011; Paret, 2016; Smith & Pun, 2018)。在過去 10 年間熱鬧的討論之後，precariat 作為學術概念的熱度正在降低，似乎正要變成另一個僅僅留在學術史中的詞彙。然而，precariat 概念所描繪的現實圖景變化是真實的，所以在它可能被遺忘之前，重新檢視這個概念的意義、總結它能夠帶來的啟發是必要的。因此，本文回顧了 precariat 概念的主要內涵，討論了這個概念在怎樣的背景下引發了哪些辯論；在全球勞工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沉重打擊的背景下，本文用現實案例簡要討論了它為何沒有進入現實運動的動員。本文希望以此反思圍繞 precariat 的辯論給勞工行動到底能夠留下哪些啟發。

一、Precariat 的概念內涵

Precariat 概念的主要提出者和推廣者是英國經濟學家斯坦丁，他在很多著作與文章中以近乎同意反復的方式闡述了對 precariat 的概念化(例如 Standing, 2011, 2014a, 2014b, 2014c)。斯坦丁(Standing, 2011)認為，precariat 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勞工群體、特別是年輕一代勞工正處於日益增加的不穩定性之中。勞工處境的不穩定性起源於 1970 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發展。當時，美國、英國和中國等主要國家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新自由主義的道路，成為了當代世界史的一個轉捩點(Harvey, 2007)。在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神話中，企業必須能夠隨時調整生產的規模與經營策略，因此也必須建立勞動彈性(labor flexibility)。斯坦丁提出，這種彈性包含了數量上的彈性(隨時解雇工人)、功能上的彈性(隨時改變工作內容和分工方式)以及工資彈性(企業不斷和工人重新談判工資)。多種彈性的疊加導致了一個新的勞工階級的出現。(Standing, 2011)

斯坦丁從生產關係、分配關係和勞動者主體認同三個方面定義一個階級。Precariat 階級所面對的特殊生產關係是，勞動者的勞工權利遭到了大面積侵蝕，甚至勞動者往往要先做很多無償工作，才能找到有償雇傭的機會(work-for-labor)。在分配關係中，勞動者與企業和國家之間退化成了一種最低限度的關係，既沒有企業的勞動福利，也失去了國家再分配所包含的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除此之外，precariat 所能依賴的社會收入

² 當然，全民基本收入的主張在 1990 年代已經出現，而且已有非常多的討論。(參考 Pateman & Murray, 2012; Wright, 2006)

(social income) 也在減少，更加依靠工資 (wage)；在這樣的生產關係與分配關係中，以工作基礎的認同感也逐漸瓦解，處於不穩定狀態的勞動者也產生了一種不穩定的精神 (precaritised mind)，以短視的思維習慣 (short-termism)，同時處理很多兼職、家務勞動、照料工作、甚至是應付政府的各種要求等任務 (multi-tasking)。(Standing, 2011, 2014a)

因為不穩定的工作、不穩定的收入、以工作為基礎的認同感的缺失，處於不穩定性中的勞工正在形成一個新的階級。Precariat 的階級地位甚至低於傳統的工人階級，其內部構成也非常多樣：無法獲得穩定工作的工人階級後代，移民、少數族裔、難民等公民權利受限的「次等公民」(denizens)，還有人數不斷增長的、教育良好卻缺乏工作機會的年輕人。最後，precariat 是「新的危險階級」(the new dangerous class)，因為他們的階級利益意味著他們既不會支持利於資方的新自由主義，也不想回歸傳統工人階級的工會主義。Precariat 也是一個全球性階級，因為全球勞工都處於類似的不穩定處境中。(Standing, 2014a)

二、對階級概念的批評

儘管斯坦丁恰當又生動地描述了 precariat 的生活體驗，揭示了教育加速商品化、勞工仲介與派遣工、不充分就業等現象如何讓他們陷入不穩定就業的惡性循環 (Standing, 2011, 2014a)，但是 precariat 作為一個階級概念遭到了廣泛批評。

首先，以不穩定性作為階級概念的基礎本身並不合理。勞工處境的不穩定性並不是在新自由主義之下才發生的。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已經解釋了資本的積累需要創造週期性波動的產業後備軍的過程：隨著某個特定產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增加，其所需要的勞動力數量會相對減少，這些工人被丟棄到產業後備軍中，為相對新興的產業提供廉價的勞動力。(Engels & Marx, 1996) 這意味著，不穩定性是無產階級的本質特徵之一，而並非某個新特徵。(Bremen, 2013) 斯坦丁的概念化以雇傭狀態定義階級身份，強調的是不同雇傭狀態的工人間的分化，這可能會推論出「勞動合同類型的改變會改變工人的階級屬性」的荒謬結論。而在現實生活中，臨時雇傭與長期雇傭的相互轉化通常是常見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Smith & Pun, 2018)

其次，不穩定無產者的主觀體驗也並非獨特的新現象。缺乏對工作的認同感讓人聯想到馬克思所描述的「異化」現象：工人從自己的勞動過程與勞動產品異化、從人的類本質異化以及人同人的異化。(Marx, 1970) 在描述工人的主觀體驗時，顯然異化概念提供了更豐富的觀察維度。

當然，階級概念一直存在著馬克思主義和韋伯主義兩種傳統。馬克思主義傳統強調生產領域，強調勞動與資本的對立，強調階級概念的衝突本質；韋伯主義傳統強調市場

能力，強調階級的社會分層內涵。斯坦丁的概念化一方面偏向于韋伯主義傳統（尤其體現在他的多層分層模型中），同時他的「新的危險階級」命題卻混淆了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觀點。從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看，斯坦丁沒有注意到，階級概念必須是關係性的，產生於資本與勞動的對立關係之中；沒有這種關係性的視角，也就無法推論出所謂「危險階級」的命題。（Smith & Pun, 2018）

最後，在馬克思主義視角看來，階級形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工人階級是在特定的政治、歷史與文化背景中，在資本與勞動以及不同勞工群體的互動中產生的。（E. P. Thompson, 1964）相比之下，斯坦丁的陳述相對簡單，對於階級形成的過程缺乏結合特定歷史與文化背景的分析。

三、Precariat 的全球南北分化

除了在總體上對這個新的階級概念持否定態度之外，很多評論者進入了斯坦丁的論述的細節，或者受到這個概念的啟發，發展了新的觀點。儘管斯坦丁認為 precariat 是一個高度整合的、全球化的新階級（Standing, 2011），評論者們指出，以歐洲和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不穩定性」與發展中國家的「非正規經濟」為代表的「不穩定性」之間存在顯著差別。發達經濟體中的不穩定性更多地是「自上而下」的，是資本在逐步侵蝕傳統的勞工權利（Paret, 2016）；當前的不穩定性是二戰以來資本與勞工間基於凱恩斯主義或者「福特主義」的社會契約瓦解的結果；雇傭關係中的互惠關係因為新自由主義發生轉變，國家也逐步在福利體系中撤退（Kalleberg, 2009; Vidal, 2011），在雇傭關係中，企業表現出只對投資者的回報率負責、不再對雇員負責的特徵（P. Thompson, 2003）。

相反，發展中國家從未出現過這種「光輝的過去」，非正規經濟、不穩定雇傭伴隨著其工業化過程一直存在（Breman, 2013），而且這裡的「非正規經濟部門」的發展往往是「自下而上」的，是人們必須創造自己的工作機會、尋求生存韌性的努力的結果（Paret, 2016）。從 1970 年代以來，非正規經濟部門一直是第三世界經濟的主要特徵，其中女性尤其扮演了重要角色。（Standing, 1999）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越來越多的歐洲年輕人處在不工作、不上學、也不在就業培訓中的狀態，成為了 precariat 的一部分（Foti, 2017），但是這種現象其實是歐洲所獨有的；關於中國的 80 後、90 後年輕人的討論聚焦于新生代農民工（Ngai & Huilin, 2010）或者是新興產業中的白領勞工（LI, 2019）。

在全球視角下，不穩定性的定義本身也是相對的，受到特定的文化與背景的影響。西方發達國家的不穩定，在發展中國家可能被視為是穩定的；歷史性地看，不穩定性也是持續鬥爭的結果，而不是線性變化的。（C. K. Lee, 2019）這種全球南北分化挑戰了斯坦丁「全球化的新階級」的概念，提出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視角下的「勞工問題」，即

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理解勞工作為行動者的角色。(Chhachhi, 2014)

值得一提的是，斯坦丁關於 precariat 的論述內部也包含相互競爭的觀點：儘管他聲稱 precariat 是「新的危險階級」，但是他又將他們描述為缺乏組織、需要某種「上層設計」解救的群體（主要是國家的普遍福利）。(Paret, 2016) 這種觀點在「次等公民」命題中體現得最為清楚，因為作為勞工中最為弱勢的群體，他們是需要國家的救濟、甚至要向國家和資本「乞討」的群體。這樣的論述顯然和「危險階級」命題之間存在緊張關係。事實上，斯坦丁將 precariat 從傳統工人階級中區分出來的觀點，從勞動與資本的關係視角看來，強調了工人階級不同部分的區別、弱化了工人階級整體作為變革主體的力量。(Breman, 2013)

正如不穩定性的全球南北分化一樣，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也自然產生了全球南北分化：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語境中，斯坦丁尤其因為對於「公民身份」的強調而進入了關於「波蘭尼式運動還是馬克思式運動」的討論。波蘭尼在近年來西方勞動運動的討論中重新「被發現」，成為了理解勞工運動的關鍵視角；在某種程度上，precariat 概念的討論也可以視為這種趨勢的一部分。相比之下，在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中，學術辯論的焦點依然圍繞著馬克思主義視角的「無產階級化過程」展開，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理解中國的工人在更加不穩定的處境下作為無產階級的抗爭。

四、西方討論：公民權與「雙向運動」

斯坦丁本人已經意識到了「公民權」在 precariat 概念中的關鍵地位，所以在後期為自己辯護的文章中，他提出「precariat 是歷史上第一個系統性地喪失為公民所建立的權利的群眾階級」。(Standing, 2014c) 斯坦丁認為，precariat 常常是「次等公民」，意為「在企業或國家中，一種或多種傳統的公民權受到限制的人」。女性、少數族裔、移民工人是「次等公民」的典型代表，是 precariat 的重要組成部分。(Standing, 2011)

以公民權的視角理解一種階級運動或者勞工運動顯然超出了馬克思式的理解。近年來，西方勞工運動研究重新發現了波蘭尼關於市場擴張與社會再嵌入的「雙向運動」理論，開始區分馬克思式的勞工運動與波蘭尼式的勞工運動。波蘭尼認為，市場並非獨立於社會存在，而是嵌入在社會中；市場的擴張將不能成為商品的土地、貨幣、勞動力加以「虛擬商品化」，導致市場規則對社會的過度侵入；結果會產生「社會的自我保護」，通過各種社會運動重新將市場嵌入到社會中。(Polanyi, 1957) 以此為基礎，可以區分出：馬克思式的勞工運動主要指工人階級在生產領域的反抗運動，其基礎主要是工人在工作場所的談判力量 (workplace bargaining power) 和結社力量 (associational power)；波蘭尼式的勞工運動主要指勞工群體對全球自由市場的擴張的反抗，特別是在全球經濟轉型之

下「被拋棄的」西方工人階級的運動，因為其基礎往往在工作場所之外，所以超出了傳統馬克思主義視角的範圍。(Silver, 2003) 勞工的不穩定性狀態可以被視為勞動被商品化與去商品化的程度，(Rubery, Grimshaw, Keizer, & Johnson, 2018) 這正是波蘭尼式運動的焦點。

從波蘭尼式運動的視角看，公民權利在何種程度上能夠成為勞工身份的一種指標、同時又在何種程度上能夠成為動員的資源成為了勞工行動的新焦點。從這個角度來看，斯坦丁的概念其實回歸了勞工領域的經典問題。波蘭尼式運動在實踐中啟發了勞工運動組織者深入到工人社區，通過族群網路、社區活動等方式組織工人；即勞工運動的動員超越了生產領域、進入了再生產領域。這種思路也被吸納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形成了社會再生產理論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社會再生產理論認為，所有參與整個社會再生產的「生產者」都屬於工人階級，無論是靠工資生活、臨時雇傭還是從事無償的家務勞動。(Bhattacharya, 2017)

在反抗性運動中，precariat 概念的推廣者們認為佔領運動³是這個新階級的代表性運動。除了對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的強烈不滿以外，這場運動的核心訴求即為反對華爾街為代表的市場化力量。然而，值得反思的是，市場擴張運動也是一把雙刃劍：市場的擴張雖然加深了資本主義內在的問題，但是同時可能促進勞動力市場上的公平競爭，這有可能有利於少數族裔與弱勢群體的解放。美國 1960 年代的平權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就受益於市場的擴張運動，女性正是依靠市場擴張提供的工作機會才能夠爭取到更平等的地位。而今天市場化已經走向了「解放」的反面，因而成為了抗爭的主要目標。(Fraser, 2017)

當然，precariat 視角如何在勞工運動的理論化與動員中發揮實際作用，斯坦丁所給出的解答非常有限，所以在西方的勞工運動討論中，precariat 概念沒有成為主流的理論資源。但是相關議題的討論顯然是有現實意義的。「次等公民」命題所暗示社會身份差異與市場化之間的關係是曖昧的：例如，市場化可能帶來平等化效應；但是，不同族群的社會網路也可能成為波蘭尼式運動的資源。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勞工群體處於非常不同的狀況中，所以相關討論的焦點也非常不同。下面以中國的情況舉例加以說明。

五、中國的 Precariat

斯坦丁也將 precariat 概念應用到了中國的勞工群體。他認為，中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 (domestic migrant worker) 符合這個概念的所有特徵：他們的工作是不穩定的，而且一直處於流動之中；他們只能依靠工資收入，既不能確保得到企業提供的各種社會保險，

³ 參考 <http://www.occupy.com/>.

也因為沒有城市戶口被剝奪了城市的教育、醫療、低保、養老保險等社會權利；他們的思維也只能是短視的，沒有能力在城市做長遠生活的規劃。所以，農民工是同一個國家內部的次等公民，是中國的 precariat 主體。(Standing, 2017) 但是，將 precariat 概念應用到中國的農民工群體能帶來哪些理論上的洞見，又會帶來什麼風險？特別是它作為階級概念，是否有利於理解中國的勞工運動以及勞工運動的動員？

更加熟悉中國勞工狀況的學者借用 precariat 的概念來進一步分析中國長期存在的非正規經濟部門以及勞工群體的內部劃分。從社會主義中國時代開始，中國勞工群體的等級分化就一直存在。上層的工人擁有城市戶口、穩定的崗位以及相對輕鬆的工作，同時季節工、合同工等相對更不穩定的群體一直存在。(例如，C. K. Lee, 2019; Swider, 2017) 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工廠中，季節性流動的工人也一直處於高流動中，很多企業每年都需要重新招工。(例如，C. Lee, 1995; Pun, 2005)

有些學者認為，不應該將 precariat 視為某些客觀條件規定的具體人群，而更應該關注「不穩定化」的過程 (precariatization as a process)，既關注勞工客觀狀況的不穩定性，也關注不穩定雇傭中多樣化的主體性體驗(例如，Alberti et al., 2018)。李靜君使用「不穩定化」(precariatization) 的概念來描述新生代農民工 (1980-90 年代出生的農民工群體) 的狀態與處境的變化：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穩定性很低，在同一崗位的停留時間只有 1-2 年甚至幾個月；在他們的身份認同中，「農民身份」已經消失殆盡，而且在政府與資本的合謀下，他們正在失去在農村最後的生活保障：耕地 (1987-2000 年間中國增加了約 5200 萬失地農民)。(C. Lee, 2016) 所以，「不穩定性」(precariousness) 用來描述中國當代農民工所面臨的不穩定的工作與生活條件，是個非常有益的概念。(Smith & Pun, 2018)

在此基礎上，李靜君進一步提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穩定化」的機制有所不同。在社會主義中國 (1949-1978)，不穩定性的主要來源是國家體制的直接干預。在性別、技能水準與地域的差別之外，國家還根據所有制類型、核心與邊緣產業區分、戶口制度、黨員身份以及雇傭身份等標準區分工人。在高速增長的市場化改革時期 (1980-2009)，中國工人開始被捲入跨國資本的彈性積累，此時的 precariat 群體主要包括分包制度下的建築工人、街頭商販、家務勞動者以及學生實習工等等；在這個階段中，國家主要通過壟斷勞工代表權 (通過唯一合法的全國總工會)、發展至上主義的意識形態滲透以及有策略地更新與運用勞動法維持工人的不穩定性；2010 年以來，中國進入了相對低速增長的「新常態」，產生不穩定性的原因主要是國家主導的城市化對農民土地的剝奪、強迫勞動者加入平臺經濟等「個人創業」體制以及進一步打壓工人集體行動的空間。(C. K. Lee, 2019)

六、關於中國勞工抗爭的辯論

然而，「不穩定化」概念不僅描述了中國勞工面對的不穩定性日益增長，同時也強調這種過程背後國家與資本的力量。面對這種不穩定性，學者們關於如何看待勞工抗爭的特徵與變化產生了分歧，由此引發了激烈的辯論。

首先，斯坦丁關於「新的危險階級」的命題因為過於籠統，所以並沒有得到中國勞工研究者的採納。拒絕這種概念的人認為，中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群體是一個半無產階級群體、一個正在形成的工人階級。(Ngai & Huilin, 2010; 沈原, 2006) 即使是接受這個概念的李靜君也提出，應該用一種多維度的關係性視角來看待 precariat，將勞工置於其與國家與資本的關係之中看待，而不是將這個概念固定為擁有某些特徵的群體。(C. K. Lee, 2019) 讓不同學者產生分歧、進入激烈辯論的問題是，處於不穩定性中的中國勞工群體、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是否正在變成一個「自為的階級」、展現出了更多的抗爭力量？

相對樂觀的勞工學者認為，中國的工人階級處於形成的過程中。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分離造就了不完全的無產階級化，而更加不穩定的處境會加速無產階級化的過程；事實上，中國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徹底失去「農民認同」，更渴望融入城市；他們也擁有了更強烈的權利意識、抗爭意識、反抗資本壓迫的意識；1995年《勞動法》實施以來，工人抗爭運動的數量並沒有減少。(參考，C. K. Lee, 2019; Ngai & Huilin, 2010; Smith & Pun, 2018) 總之，更加惡劣的處境與更有工人認同與權利意識的新生代農民工的結合，將產生更多的勞工抗爭運動；應該以馬克思式的工人階級運動視角來理解這種變化。

與之針鋒相對的是，李靜君提出「不穩定化」過程起因於國家與資本的合謀，中國工人的處境是「威權體制下的不穩定化」(Authoritarian Precariatization)。國家一方面借助《勞動法》規範工人的合法抗爭，同時通過選擇性執法、說服、分化、離間、承諾物質回報、鎮壓等手段應對工人抗爭；工人的抗爭雖然很多，但是主要以順法抗爭(工人們盡力在不違法的情況下，向工廠和政府表達爭取自己合法權利的意見)的形式出現，而且通常以單個工廠為單位、缺乏更廣泛的團結，訴求也相對單一，以直接經濟回報為主；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流動性過高，因而缺乏有效團結；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觀體驗也並非戰鬥性的，而是不斷地表達一種「迷失、不確定、被異化、生活沒有意義」的負面情緒；既想要掙錢消費，又因為收入低在消費主義面前感到挫折。(參考 C. Lee, 2016; C. K. Lee, 2019; C. K. Lee & Zhang, 2013) 國家的各種控制技術與勞工孱弱的力量相互對比，體現了對當前中國勞工運動與抗爭的悲觀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對於力量對比和勞工抗爭趨勢的判斷不同之外，辯論雙方對於勞工抗爭形式的認識也有諸多不同。以潘毅為代表的樂觀派所看到的勞工抗爭形式更加

多樣、內涵也更加豐富。在她看來，工廠中工人的反抗形式包括消極怠工、工廠靜坐、偷盜與破壞，更加激進的公開罷工與維權，甚至是富士康的工廠中的連續工人自殺、工廠女工面對嚴格的工作排程與高強度的工作活動所感受到的身體疼痛與夢魘也是一種反抗。（參考 Ngai & Huilin, 2010; Pun, 2005; Smith & Pun, 2018; 潘毅, 1999）

七、疫情危機下的勞工運動反思

從上面的討論中可以發現，在斯坦丁提出 precariat 概念之後，相關的討論已經進入了非常分散的領域。首先，評論者們注意到了全球化下的南北差異。儘管斯坦丁非常希望將第三世界中承受不穩定工作條件的勞工納入到他的概念化中，發展中國家長期處於非正規經濟部門中的弱勢勞工和發達國家中無法回到「凱恩斯主義」的失落的工人階級處境完全不同。在發達國家中，斯坦丁的討論可以被置於近幾十年來更加活躍的「波蘭尼式勞工運動」的背景下理解。公民權的系統性缺失以及相應抗爭是對市場邏輯過度擴張的反抗路徑之一。在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precariat 概念一方面可能有助於理解勞工生存狀況的不穩定化過程，但也可能帶來勞工在面對國家與資本時更加無力的「悲觀主義」。

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全球危機顯然給勞工帶來了更多的不穩定性。以美國為例，疫情之下有超過 4000 萬勞動者登記失業，失業率高達 23.9%，幾乎每 4 個工人中就有 1 個失業；（Lamber, 2020）然而與此同時，美國「10 億美元俱樂部」（billionaires）的財富在 3 月到 5 月之間反而增長了 4340 億美元（Frank, 2020）。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可以從現實的勞工運動中反思到底怎樣的敘事結構與策略對於勞工的行動與團結是有益的。

這裡先舉出兩個簡單的案例。中國廣州的清潔工因為外包體制承受著最低工資、罰款、被迫超時過勞工作以及雇傭不穩定等問題。在中國疫情期間，他們依然被迫在公共場所工作、不時接觸被丟棄的口罩等垃圾，面臨著更高的感染風險。在 2-3 月之間，廣州的環衛工和公益組織在網路上發起了相應的輿論動員，控訴勞務派遣公司沒有給他們提供足夠的口罩以及口罩品質問題，導致他們暴露在更高的風險下；同時也有行動者發起為環衛工人捐贈口罩的運動。⁴在這個案例中，廣州清潔工的處境與行動敘事最接近 precariat 概念的陳述。清潔工是不穩定性的受害者，在他們的行動敘述中，他們的主要訴求是勞動者的「基本權利」沒有得到保障，呼籲雇主提供必要的防護，同時作為「受害者」需要公眾的支援與說明。

另一個案例是美國小鎮伊薩卡的一個服務業工人工會在疫情期間的行動。在 3 月開

⁴ 相關資訊可以參考廣州環衛工人權益組織「心環衛」的微博：[@心環衛](#)。

始的疫情衝擊下，紐約州要求所有餐飲業只能提供外帶服務，這意味著服務業人員的工作小時數驟減、小費等收入也急劇減少，部分員工被裁員；在這種情況下，伊薩卡 Gimme 咖啡的員工立即通過工會和雇主談判，要求提供基金醫療病假的福利；在談判失敗後，工會又開始積極向公眾募捐以支援會員的日常生活（已募集近 12000 美元）。儘管之後 Gimme 暫停了營業、所有咖啡師暫時被解雇，工會成員依然通過線上會議聯繫，也線上支持當地的「凍結租金」（全城暫停收租以保護租戶、防止有人因疫情失去住所）等運動。⁵

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同樣因為疫情處於就業不穩定與健康風險的雙重不確定之下，Gimme 工會的敘事策略並沒有過於強調「受害者」角色，而是選擇主動地、強硬地和雇主談判，同時有組織地向當地社區尋求幫助以支持工會成員，還積極支持當地的其他公共行動。這是一種「行動中的工人」的敘事。

當然，兩個案例的區別同時受到當地的勞工運動傳統、政治環境、具體的工人組織情況等因素的影響。這裡想要說明的是，處於不穩定之中的工人既可以採取不穩定的「受害者」敘事，也可以採用與資方鬥爭的「行動中的工人」的敘事。敘述邏輯的選擇本身，或許也是工人行動策略的一部分，是勞工主體性的體現。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哪種敘事都無法擺脫工人與資方、工人與所在社區的關係。這正是斯坦丁的「危險階級」命題中的缺失之處。

從這個角度來看，斯坦丁所論述的「不穩定性」只是一個描述性概念；但是這個概念只是一個起點，因為它既沒有詳細闡述形成不穩定性背後的資本主義運作機制，也沒有指明勞工運動的可能方向；從這個角度來看，盲目地聲稱這是「新的危險階級」反而提出了「一個危險的概念」。(Smith & Pun, 2018) 當然，precariat 概念的流行可以促進人們增加對勞工不穩定處境的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這個概念抓住了現實勞工狀況的一個特徵才能引起如此多的關注。以更深入的方式認識新自由主義不斷生產的極端不平等，也是促進勞工行動的一部分。但是，勞工研究者不應自滿於舞弄一些新的概念，在靠近真正重要的勞工行動議題時止步不前。

參考書目

- Alberti, G., Bessa, I., Hardy, K., Trappmann, V., & Umney, C. (2018). In, against and beyond precarity: work in insecure times.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32(3), 447-457.
- Bhattacharya, T. (2017). How not to skip class: Social reproduction of labor and the global working class.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mapping class, recentring oppression*, 68-93.

⁵ 相關資訊可以參考 Gimme 咖啡的 Facebook 主業：Gimme Baristas' Union。

- Breman, J. (2013). A Bogus Concept?[Review of: G. Standing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New left review*, 84, 130-138.
- Chhachhi, A. (2014). Introduction: the ‘Labour Question’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5(5), 895-919.
- Engels, F., & Marx, K. H. (1996).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5,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New York, NY: New York, N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Foti, A. (2017). *General Theory of the Precariat*. Amsterdam: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 Frank, R. (2020). American billionaires got \$434 billion richer during the pandemic.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nbc.com/2020/05/21/american-billionaires-got-434-billion-richer-during-the-pandemic.html>
- Fraser, N. (2017). A triple movement? Parsing the politics of crisis after Polanyi. In *Beyond neoliberalism* (pp. 29-42): Springer.
- Harvey, D. (2007).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 Kalleberg, A. L. (2009). 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4(1), 1-22.
- Lamber, L. (2020). Over 40 million Americans have filed for unemployment during the pandemic—real jobless rate over 23.9%. Retrieved from <https://fortune.com/2020/05/28/us-unemployment-rate-numbers-claims-this-week-total-job-losses-may-28-2020-benefits-claims-job-losses/>
- Lee, C. (1995). Engendering the Worlds of Labor: Women Workers, Labor Markets, and Production 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Economic Mirac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3), 378-397.
- Lee, C. (2016). Precarization or Empowerment? Reflections on Recent Labor Unrest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5(2), 317-333. doi:10.1017/S0021911815002132
- Lee, C. K. (2019). China’s precariats. *Globalizations*, 16(2), 137-154.
- Lee, C. K., & Zhang, Y. (2013).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6), 1475-1508.
- LI, X. (2019). The 996. ICU Movement in China: Changing Employment Relations and Labour Agency in the Tech Industry. *Made in China Journal*.
- Marx, K. (1970).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1st American ed. ed.).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Ngai, P., & Huilin, L. (2010).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 *Modern China*, 36(5), 493-519.
- Offe, C. (2011). The Vanishing “Shadow Of The Future”—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52(3), 466-474.
- Paret, M. (2016). Politics of Solidarity and Agency in an Age of Precarity.
- Pateman, C., & Murray, M. C. (2012). *Basic Income Worldwide: Horizons of Reform*: Palgrave Macmillan.
- Polanyi, K.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 Pun, N. (2005). *Made in China :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 Press/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Rubery, J., Grimshaw, D., Keizer, A., & Johnson, M. (2018). Challeng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normalising' of precarious work.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32(3), 509-527.
- Silver, B. J. (2003).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C., & Pun, N. (2018). Class and precarity: An unhappy coupling in China's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32(3), 599-615.
- Standing, G. (1999). Global Feminization Through Flexible Labor: A Theme Revisited. *World Development*, 27(3), 583-602. doi:10.1016/S0305-750X(98)00151-X
- Standing, G.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 Standing, G. (2014a). *A precariat charter: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A&C Black.
- Standing, G. (2014b). Under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rough labour and work.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5(5), 963-980.
- Standing, G. (2014c). Why the precariat is not a "bogus concept". *Open Democracy*.
- Standing, G. (2017). The precariat in China: A comment on conceptual confusion. *Rural China*, 14(1), 165-170.
- Swider, S. (2017). Informal and precarious work: the precariat and China. *Rural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14(1), 19-41.
- Thompson, E. P. (1964).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Thompson, P. (2003). Disconnected capitalism: or why employers can't keep their side of the bargain.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17(2), 359-378.
- Vidal, M. (2011). Reworking postfordism: Labor process versus employment relations. *Sociology Compass*, 5(4), 273-286.
- Wright, E. O. (2006). Basic income as a socialist project. *Basic income studies*, 1(1).
- 潘毅. (1999). 開創一種抗爭的次文體：工廠裡一位女工的尖叫，夢魘和叛離. *社會學研究*, 5(1), 24-37.
- 沈原. (2006). 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 *社會學研究*, 2, 13-36.